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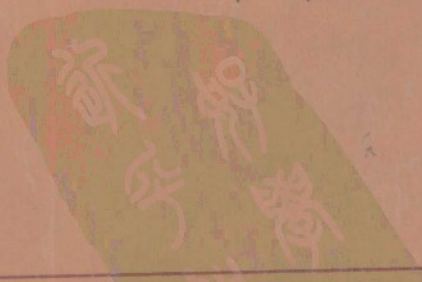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

儒藏

史部
第一十四冊

四川大學出版社



2,26
18
3



儒藏

儒藏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



四川大學出版社

儒藏

責任編輯:陳國弟 陳建明

責任校對:石大明

封面設計:文小牛

責任印制:吳雨時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儒藏. 史部. 歷代學案 / 舒大剛, 楊世文主編. — 成都: 四川大學出版社, 2005.5

ISBN 7-5614-3052-3

I. 儒... II. ①舒... ②楊... III. ①儒家②儒家—學術思想—思想史—中國—古代 IV. B22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05) 第 038118 號

書名 儒藏. 史部. 歷代學案

主 編 舒大剛 楊世文
出 版 四川大學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一環路南一段 24 號 (610065)
發 行 四川大學出版社
印 刷 成都東江印務有限公司
開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張 1015
字 數 9874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數 001~150 套
定 價 12650.00 圓

版權所有◆侵權必究

◆讀者郵購本書,請與本社發行科
聯系。電話:85408408/85401670/
85408023 郵政編碼:610065

◆本社圖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請
寄回出版社調換。

◆網址:www.scupress.com.cn

國家「211工程」重點學科建設項目

國家「985工程」創新基地規劃項目

中國孔子基金會重大項目

蘇子學

《儒藏》工作委員會

主任：謝和平

副主任：羅中樞 陳愛民

委員：呂重九 李志强

孫衛國

楊繼瑞

周學東

李虹

魏于全

石堅 李光憲

趙昌文

張樹驊

宋紹峰

夏華祥

陳謙明

項楚 曾棗莊

孫錦泉

陳國弟

潘顯一

王挺之

舒大剛

總監：楊泉明 韓喜凱



《儒藏》學術委員會

主任：項 楚 曾棗莊

常務副主任：舒大剛

委員（以姓氏筆畫爲序）：

刁忠民	王新春	田海平	申屠爐明	李文澤	李 申	李 剛
李宗桂	李景林	呂文郁	呂紹綱	吳 光	吳榮曾	吳洪澤
胡昭曦	郭 沂	郭 齊	陳廷湘	陳恩林	曹順慶	黃玉順
黃開國	常金倉	梁韋弦	張文軒	張希峰	葛志毅	單 純
賈順先	蒙 默	鄒重華	楊世文	楊朝明	蔡方鹿	廖名春
謝維揚	鄭萬耕	萬本根	劉 琳	劉復生	謝幼田	濮茅左



《儒藏》編纂委員會

主 編：舒大剛 張樹驊

編 委（以姓氏筆畫爲序）：

刁忠民 王小紅 王智勇 王蓉貴 尹 波
吳洪澤 邱進之 郭 齊 黃錦君 張尚英
劉 琳 劉德清 繆文遠
李文澤 李冬梅 李勇先
彭邦明 曾棗莊 楊世文

技術總監：吳洪澤 學術骨幹：楊世文

資料總監：尹 波 責任校對：李國玲

質量終審：劉 琳 李文澤 郭 齊 刁忠民 舒大剛

鳴謝（排名不分先後）：

- 葉選平先生（國際儒學聯合會）
楊波先生（國際儒學聯合會）
于友先先生（中國出版家協會）
任繼愈先生（國家圖書館）
孔德懋先生（孔子七十七代孫）
林金華先生（馬來西亞孔學研究會）
湯一介先生（北京大學）
李學勤先生（清華大學）
張立文先生（中國人民大學）
錢遜先生（清華大學）
隗瀛濤先生（四川大學）
周桂鈿先生（北京師範大學）
趙吉惠先生（陝西師範大學）
蔣秋華先生（臺灣中央研究院）
段志宏先生（巴蜀書社）
水賁佑先生（上海古籍出版社）
- 劉忠德先生（國際儒學聯合會）
曹鳳泉先生（國際儒學聯合會）
周興俊先生（綏裝畫局）
龐朴先生（中國社會科學院）
湯恩佳先生（香港孔教學院）
陳啟生先生（馬來西亞孔學研究會）
安平秋先生（北京大學）
朱慶之先生（北京大學）
李書有先生（南京大學）
董治安先生（山東大學）
劉大鈞先生（山東大學）
冉光榮先生（四川大學）
王庭科先生（四川大學）
林慶彰先生（臺灣中央研究院）
陳俊民先生（陝西師範大學）
黃松先生（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

儒藏總序

《儒藏》是收集保存儒學文獻的大型叢書。她薈萃二千餘年儒學著作，以系統的著錄體例，分門別類地予以標點、校勘和編排。她作為中國古代儒學成就之集成，可望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象徵，與《大藏經》、《道藏》鼎足而三，永遠滋養中華民族的心靈。今值《儒藏》出版之際，聊述因緣，以弁篇首。

一

儒學是中國的。二千五百多年前，中國的孔子集虞、夏、商、周優秀文化之大成，總《詩》、《書》、《禮》、《樂》、《易》、《春秋》為「六經」，樹「仁義」「誠信」之高標，垂「中庸」「忠恕」之宏法，創立儒學，垂教萬世。儒學生於斯，長於斯，昌盛於斯，亦曾一度衰微於斯。兩千多年來，儒學是引導中國文化走向輝煌的指南北斗，是鑄造中國文化特質的規矩準繩。她是中國文化之門、中國文化之蘊，對中國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各個方面都產生了重大影響，促成了中國人特有的世界觀、價值觀和思維方式的形成。她是中華民族精神的核心，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幹和靈



魂。在國際範圍內，人們一提起中國文化，首先想到的無疑就是孔子，就是他所創立的儒學。儒學是中國的，中國也是儒學的。要深入研究中國文化，欲準確地瞭解中國歷史，不認識孔夫子，不研究儒學，就不能得其門而入。

儒學是東方的。古代東方，北起朝鮮半島，東至日本列島，南到印支半島、南亞諸國，伴隨着儒家「偃武修文」、「睦近徠遠」外交方略的實施，東亞各國「成鈞館」（朝鮮）、「大學寮」（日本）、「國子監」和「國學院」（越南）等文教機構的設置，大批「遣隋使」、「遣唐使」的派遣，儒學早已融入東方社會，成為東方各個國家、各個民族共同的思想體系和價值觀念的重要部分；東方各國的政治家、思想家，或用儒學治世，或以著書明理，與中華學人一道共同豐富和發展了儒學的理論和思想。因此國際「漢學界」在討論東方社會時，無不異口同聲地稱之為「儒家文化圈」。

儒學又是世界的。作為「四大文明古國」之一的中國的文化主流，儒學不僅影響了東方，而且也輻射於世界。就古代而言，先秦儒學是西方學者公認的世界文化「軸心時代」的主流思想，是古代東方思想文化的源頭活水。儒學是開放性的。在歷史發展演進的長河中，儒學不斷以其「海納百川」、「集雜為醇」的包容精神，融合含攝了各種外來文化與文明，與時並進，日新其德，使思想之源長盛，學術之樹常青。儒學在歷史上不斷兼容並包各家學術進行自我創新的歷史，是中國文化生生不息充滿創造活力的歷史，是人類文化寶庫日新月異不斷豐富的歷史，也是儒學不斷影響和輻射世界的歷史。她的經典和理論曾西涉流沙，遠渡重洋，對近代思想啟蒙和現代文明的形成產生過不可忽視的影響。在當今世界文化格局中，她又作為十三億中國人



和數千萬海外華人和僑胞共同的文化背景，卓爾屹立于基督教文明與伊斯蘭文明之間，倡導「以和爲貴」、「和而不同」的和平共處哲學，以其「立己立人，達己達人」和「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忠恕精神，化解各種矛盾，調停地區衝突。

儒學是歷史的。在儒術「獨尊」的時代，儒學不僅是中國古代的學術，而且也幾乎是中國學術的古代，她與古代中國文化的各個方面都結下了不解之緣。殷墟甲骨文有「儒」與「丘儒」之官，《周禮》有「師儒」之職，儒者在殷商時期就已發揮着重要作用。至春秋時期，孔子正式創立儒家學派，孔門弟子散遊四方，「六藝」之學風行天下，開啓了春秋戰國時期士人的智慧，催生了諸子學派，促成了百家爭鳴。從這個意義上講，沒有儒學就沒有周秦學術。繼而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家經典教育與研究影響了中國兩千餘年的教育、選舉和文化。可以說，中國的古代史主要就是儒學影響中國的歷史。沒有儒學便沒有古代中國的教育，也就沒有古代中國的學術，也就不會有燦爛的中國文化。人類不可能生活在沒有歷史的真空之中，對於逝去的昨天，對於先賢的遺產，我們應該以回顧、反觀、總結與傳承的姿態，在歷史繼承的基礎上進行創新，用富有民族特色的創新來豐富歷史、美化生活。作爲與中國歷史水乳交融的儒學，當然不能游離於歷史繼承之外。

儒學又是現實的。孔子說：「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中國是文明古國，她的「古」不僅在於歷史上曾經有過，而更在於其歷史傳統一直在延續着，其優秀文化一直在弘揚和發展着。由殷可以見夏，由周可以觀殷。

後世之「繼周者」，有秦、有漢、有晉、有唐、有宋、有元、有明、有清，其民族則有華夏、有「四裔」，有漢族、有少數民族。然而，祇要是在華夏文化圈內崛起，祇要是在中華大地上立國，無論願意不願意，主動或被動，都必然打上儒學文化的烙印。綜觀古今歷史，無一例外。即使是少數民族入主中原，也必將被中原固有文化所融合。如果說，在春秋戰國時期還存在「以夷變夏」和「以夷變夏」的爭論，那麼自秦漢以後的中國，無論誰來當皇帝坐天下，就毫無例外地是以「華化」「漢化」為主流的多民族融合。「五胡十六國」是這樣，遼、金是這樣，蒙古族建立的元朝也不例外，滿族建立的清朝更是如此。其原因也許有多種多樣，但其中以儒學為主體的華夏文化代表了當時的先進文化，代表了各族文化發展的共同方向，則是最深層的原因。特別是儒家從理論上將這一文化總結出來，建立起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的「道統」體系，形成虞、夏、商、周、秦、漢、魏、晉、隋、唐等「正統」觀念，並從教育上、實踐上宣傳和推廣開來，從而形成了以儒學為核心的華夏文明的感召力和吸引力。儘管有些觀念在今天已顯得陳腐和落後，但它是千百年來維繫祖國統一、加強民族團結的精神力量，更是激起「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之豪情的潛在動力。今天，即使我們已經跨入世界經濟全球化的時代，瞬息萬變、不可捉摸的世界局勢，曾使傳統文化被世俗化（甚至庸俗化）的社會和多元化（甚至詭異化）的思想所困厄，以致於一些人曾一度產生過擺脫文化傳統「束縛」的想法。然而事實反復證明，文化傳統是無法擺脫的，儒學對新世紀、新世界的作用和影響仍然是不可低估、不容忽視的。她已呈現出與日俱增、歷久彌新之勢。隨着中國的和平崛起、綜合國力的不斷提高，中華民族的精神面貌



也將煥然一新，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和中國人既有的價值觀念正在得到重新審視，儒學這一古老學科必將煥發出壯麗的青春，儒家思想也將一如既往地作用於當今的世界。否則，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一百餘位諾貝爾獎得主在巴黎討論「面向二十一世紀」問題時，怎會發出「人類要生存下去，必須回到二十五個世紀以前，去吸取孔子的智慧」的呼聲！二零零四年八月，來自世界各地的二百餘位專家學者齊集馬來西亞首都吉隆坡，召開「第一屆儒學國際研討會」，代表不同文化背景的專家學者深入討論了儒學各類理念後，形成了《吉隆坡宣言》，宣稱儒家「忠恕之道」是促進世界和平、物我相諧的基石」，提議「正式啟動『以儒學救世』的機運，締造二十一世紀儒學另一個國際化的新局面」！

儒學是理論的。儒家是一個陣容龐大的學術集群，儒學是一個內容豐富的思想體系，她集哲學、政治、倫理、社會、教育以及其他文化思想觀念為一體，是中國精神的集中體現。其「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易大傳》）的命題，構成了中國人的宇宙模式和世界觀。「過猶不及」、「中正」「中庸」（孔子）的辯證思維，形成了中國人高超的思維方式和處世哲學。「仁義禮智信」（孔子、孟子、董仲舒）的五常之教，成了中國人作「新民」、立「新德」（《大學》）的指導思想。追求和平、講究秩序的理論，成了中國人建立和諧社會、實現文明生活的理想模式。「載舟覆舟」（孔子的君民關係論和「民貴君輕」（孟子）的「民本」思想，成了歷代志士仁人反對專制集權、追求「仁政德治」的思想武器。「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荀子）、「內聖外王」（莊子）的修身模式，構成了中國人終身嚮往的理想人格和修身之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

施於人（孔子）的「忠恕」之道，成了中國人建立和諧人際關係的無尚法寶。這一切的一切，都經儒家的提倡、推廣，逐漸融入了中國的民族精神之中，支撐着這個民族生存、發展、繁衍，創造和豐富着自己燦爛的文化和文明。儒家經典是中國思想的源頭活水，儒家理論是中華精神的思想寶庫。我們祇要不願重過「從人到猿」的生活，當然就不會拒絕這份珍貴遺產的滋潤。

儒學尤其是實踐的。儒學是修身之學、實踐之學，倫理道德學說構成了儒家學說的核心和靈魂。儒家重視思想教育，注重個性修養和道德情操，提倡「舍生取義」、「殺身成仁」、「以天下為己任」，強調道德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它雖然上究「天人」之際，下探「心性」之微，形上無象，玄之又玄，但在講究「博學」、「慎思」的同時，又特別強調「篤行」。它的「仁」便是要「愛人」，「義」便是要行而得宜，「禮」本身就是行為規範，「智」便是要知曉「仁義」之道而慎守弗失（孟子），「信」便是要言而行之（孔子）。儒家非常重視「五倫」教育，將其定義為人倫之始、政治之本。「五品」之教首倡於堯舜之《典》，「五教」之義復申於《左傳》、《孟子》，至《中庸》更將其奉為「天下之達道」。在儒家看來，五倫不順，將倫理倒錯，人將不人；五教推行，則社會和諧，政治清明。儒家成功地將個人的品德修養與國家的治理安定緊密地結合起來，把道德主體的能動作用與社會的道德感化力量有機地融為一體，從而使道德規範的約束功能與知耻自覺的自律機制更好地相輔相成。《大學》之書將「明明德」、「新民」、「止於至善」和「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等定義為修「大道」、聞「大義」的「三綱領」、「八條目」，設為儒者奉行不貳的大綱大法，更是儒家力行躬踐哲學的集中體現。儒學正是以其理



儒藏

儒藏總序

論與實踐結合，個體修養與群體利益結合、道德修養與政治事業結合的學術思想，形成了中華民族「自強不息」、「厚德載物」、「仁義道德」、「民胞物與」、「孝親敬老」、「崇德尊賢」、「誠實忠信」、「見義勇爲」、「文明理性」、「公平正直」等優秀品德，這是有別於宗教神學的根本之處。

總之，儒學作爲歷經兩千五百餘年發展的系統理論，已成爲人類文化的共同遺產和財富。她既是中國的，也是東方的和世界的；既是歷史的，也是現實的；既是理論的，也是實踐的。儘管儒學作爲古代的一種意識形態和文化體系，也存在不太適應現代社會的內容，特別是經兩千年間專制君主利用與歪曲，她帶上了許多落後的成分。但是，我們無論是要認識中國，還是要研究世界；無論是要回顧歷史，還是要服務現實；無論是要探討理論，還是要躬行實踐，在古今中國學術中，儒學都位居首選，理當研究和弘揚。這就是她在歷經了無數風風雨雨、艱難磨煉之後，仍能像鳳凰涅槃一般不斷獲得新生的緣由所在。儒學在今天即使已經失去了從前「塞乎天地，橫乎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放諸四海而無不準」（曾參）的無所不包、無所不能的地位，但若認真地研究和認識中國，特別是中國人面對當今世界經濟全球化、政治多極化、文化多樣化的局面，要參與全球文化對話，重建人類文明新秩序，我們檢點一下自己的文化庫存，並衡之古今中外的一切學術，除了以儒學爲主體的優秀傳統文化外似乎也沒有其他的選擇。

然而，由於歷史的原因，特別是「西學東漸」大潮下導致的「中學」迷失，「疑古過勇」帶來的文化虛無主義，以致於「儒學在哪裏」、「儒學爲何物」、「儒學研究從何着手」之類不該存在的問題，在儒學誕生之地的中國卻成了嚴重「問題」。儒家著作或滅於劫灰，或毀於人禍，或流失於重洋之外。

其所存者，亦分散於群籍，雜廁於四部，未能得到有效的利用。人們常常會感到：「要研究孔子而不知孔子資料何在，欲研究儒學卻不見儒學文獻全貌，欲研究經學卻不知何經可信，何書可讀。至於在吸收儒學與經學研究現有一切成果的基礎上，作更高層次、更高水平的研究，則大有無所措手足之感。究其原因，皆在於近百年儒學傳統的丟失，尤在於儒學迄今未有一部自己的文獻集成。要擺脫儒學研究的這一隔世感與陌生感，確立儒學的本位意識，認真搜集和整理儒學文獻，建構完備的儒學文獻庫，就是十分必要而迫切的了。前人爲矯「心學」末流「束書不觀」之弊，而倡「舍經學無理學」之說，今天要糾正「疑古」過勇造成的文化虛無之失，我們也不得不重申：「舍文獻無儒學」了。這就是我們提倡編纂大型儒學叢書——《儒藏》的原因所在。

一一

在中國學術史上有所謂「三教九流」之稱，「三教」即儒、釋、道，「九流」即諸子百家。佛教的文獻已經有中外各種版別的《大藏經》收集，道教文獻也有古今諸本《道藏》彙錄，就連份量並十分龐大的諸子著作，也有《百子全書》、《諸子集成》系列來結集。可是迄今爲止，作爲中國文化主幹的儒學，卻沒有像佛、道、諸子那樣，擁有自己的大型叢書。

通觀中國歷史，每一次大規模的文化復興無不是伴隨着對前代文獻的全面搜集和整理出現的。《隋書·經籍志序》曰：「夫經籍也者，機神之妙旨，聖哲之能事，所以經天地、緯陰陽、正紀



綱、弘道德。顯仁足以利物，藏用足以獨善，學之者將殖焉，不學者將落焉。……其王者之所以樹風聲、流顯號、美教化、移風俗，何莫由乎斯道！」歷史已經昭示，儒學的創立和戰國的學術繁榮是以孔子刪訂《六經》為契機；西漢的經學初成與文化復蘇是以「除挾書之律，開獻書之路」政策的實施為先導；東漢的經學與文學、史學的繁盛也是以西漢末年向、歆父子校書為基礎。同樣，隋大業間廣泛的收書和初唐的整理圖籍，奠定了大唐文明的基石；北宋初廣泛的文獻整理，揭開了中國文化高峰時代「宋代文化」的序幕；清朝的《古今圖書集成》和《四庫全書》等大型文獻修纂工程的實施，直接促成了以「乾嘉之學」為代表的「清學」的形成。文獻是文化得以傳承和發展的載體，資料更是從事一切科學研究的基礎，文獻學和史料學正是保障文獻、史料得以科學利用和有效推廣的「先行官」。儒學要在新世紀得到發展和復興，重返淑世濟人之路，對其以文獻為載體的成果進行徹底清理和合理繼承，便是先決條件。可惜的是，大規模地搜集和整理儒學文獻，並編製成大型儒學叢書，歷史上雖屢有倡議，卻始終沒能實現，甚至專門而系統的儒學文獻著錄體系也未曾建立。這對於以儒立國、以儒治世的中國而言，無疑是莫大的遺憾。

司馬遷《史記·儒林列傳》說「孔子閔王路廢而邪道興，於是論次《詩》、《書》，修起《禮》、《樂》」。又在《孔子世家》說：「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莊子·天運篇》和《天道篇》也有孔子「治《詩》、《書》、《禮》、《樂》、《春秋》六經以為文」和孔子「繙十二經以說」的記載。說明孔子是最早將儒家經典整理出來，形成「六經」或「十二經」概念的第一人。